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三一冊

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西藏的宗教

Giuseppe Tucci 著 耿昇譯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西藏的宗教
Giuseppe Tucci 著 耿昇譯
PDG

中國書店

本冊說明

本冊與第一三二冊分別為意大利人圖齊的《西藏的宗教》和德國人海西希的《蒙古的宗教》，此次出版時將兩書書名合併，命名為《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圖齊是意大利著名的研究西藏佛學的學者，生前曾多次前往我國西藏實地考察，是意大利西藏學的創世人，如今活躍在意大利學術界的許多藏學家和漢學家都是他的學生。作者在撰寫《西藏的宗教》的過程中，注意到了藏文的佛教術語表達與西方哲學的語言習慣有很大不同，當把藏文翻譯成英語時也許會發生誤解，或者不能很好的表達出藏文原有的思想精髓，因此特別注意儘可能地將藏文專有術語翻譯成最接近其原意的英文。

全書共七章，前兩章研究了吐蕃的前弘期和後弘期佛教。從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別論述了西藏喇嘛教的基本特點、主要佛教教派的教理、寺院僧侶生活和宗教歷法及民間宗教。最後一章則特別對西藏的苯教進行了研究，因為苯教是源自西藏本土的巫教，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教的極大影響，但還是保留了自己的特點，至今仍有生命力。書末附有西藏宗教大事年表和參考書目，便於讀者查詢相關資料。

《蒙古的宗教》的作者海西希是德國當代著名的蒙古學專家，執教于波恩大學，創立了德國蒙藏研究的許多項目。

蒙古佛教源出于藏傳佛教，蒙古北部的佛教形式在原

則上于藏傳佛教是一致的，圖齊的《西藏的宗教》已經對藏傳的佛教做了詳細的研究，因此，《蒙古的宗教》除簡單論述佛教在蒙古的傳播之外，還重點研究在蒙古傳播的民間宗教觀念。全書共五章，第一章概述了蒙古人中傳播的喇嘛教以及各種民間宗教，如薩滿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蒙古的土著宗教等；第二章到第四章論述了薩滿教、喇嘛教在蒙古的傳播狀況，同時還研究了喇嘛教與薩滿教的在歷史上的鎮壓與被鎮壓關係；第五章則集中研究了蒙古的其他宗教和各種民間宗教。

兩書作者在書中引用的材料，很大一部分都以蒙藏文文獻為基礎，其次纔是其他語言的資料。兩位作者采用的這些第一手資料，大多是國內學者不易找到的抄本，因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將為我國學者研究西藏與蒙古的宗教提供極大方便。

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意〕圖 齊

〔西德〕海西希 著

耿 昇 譯

王 堯 校訂

LES RELIGIONS DU TIBET ET DE LA
MONGOLIE

GIUSEPPE TUCCI WALther HEISSIG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R.SAILLEY

PAYOT, PARIS, 1973

譯者的話

藏族和蒙古族是我國兩個人數較多的民族，他們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這兩個民族在宗教（尤其是佛教，喇嘛教）方面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即基本都屬於“藏傳佛教”。中國學者很早以來就頗為注意研究這兩個古老民族文明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宗教，歷代都留下了用各種文字所作的大量記載，近年來又陸續出現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國外的學者們在這一科學領域中也有許多不乏獨到之處見解的研究成果。為了加強國際學術交流，進一步推動我國在這一領域中的科研工作，在西藏社會科學院漢文文獻編輯室的鼓勵、幫助和支持下，我們不揣謬陋，把圖齊和海西希二人的一部世界名著《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譯作漢文出版，以饗我國西藏學、蒙古學和宗教學界同仁。

圖齊（Giuseppe Tucci，1894—1984年）是意大利的著名西藏學家。他生前曾多次前往我國西藏及其毗鄰地區考察，成了意大利西藏學的創始人。現在活躍在意大利學術界的伯戴克（Petech）等一代西藏學家和漢學家都是他的學生。圖齊長期在羅馬大學任教，曾任意大利中亞遠東學會會長等職務，很早就成了意大利科學院院士。海西希（Walther Hessig，1913—）是西德當代最著名的蒙古學家，執教于波恩大學，長期擔任該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並創立了西德蒙藏研究的許多項目，經常來我國作學術訪問。他們二人的西藏學和蒙古學著作頗多，其部分書目已分別

列于本書末的《參考書目》中了，大家可以參閱。

這部書原來是準備作為由克里斯特爾—斯勒特爾 (Christtel-M. Schroder) 博士主編的《人類宗教叢書》而撰寫的。它最早在 1970 年于西德的斯圖加爾用德文版刊行，出版後立即轟動了國際學術界，各國學者爭相翻譯介紹，成了這一學術領域中必不可缺的參考書。法國的哲學博士薩耶 (R. Sailley) 把該書譯作法文，于 1973 年在巴黎由帕約 (Payot) 書店出版。1980 年在英國倫敦就出版了英譯本，分《西藏的宗教》和《蒙古的宗教》兩冊單獨刊行。1986 年又于羅馬出版意大利文本。世界各國的學者們對本書都給予了很高評價。我們的譯文即根據賽耶的法譯本翻譯的。

由于本書中對於教理教義的論述非常詳細，初看起來有些繁瑣，但這種深入而詳盡的論述正是本書的特點和可貴之處。其目的不在于講宗教史，而是把宗教作為文化和意識來研究，反映了這兩個民族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圖齊和海西希都重點使用了藏文和蒙文資料，其中有許多是不懂這兩種語言的學者無法利用或在我國國內不大容易找到的抄本。這也是本書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圖齊和海西希是典型的歐洲中國學家。他們的邏輯推理、階級立場、觀察問題的方式以及所生活的社會背景都與我國學者截然不同。所以，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既為我們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內容，同時也暴露了與我國學者不同的或難以為我國學者接受的觀點。這是我們在閱讀本書時應注意的地方。

宗教詞匯術語本來就是極其難懂的，再加上圖齊和海西希使用了大量藏文、梵文、蒙文以及西方哲學中的術語，

而且他們經常以西方哲學觀來分析問題。這樣一來，本書的翻譯工作就特別困難了。我們在翻譯過程中，既要忠于他們的原文，又要設法盡量符合中國學者的通用語言。但我們在遇到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的，便力求忠于原文，讓讀者去琢磨、探討、體會和研究其中的含意。這樣一來，整篇譯文顯得有些晦澀難懂。但翻譯畢竟不是自己創作，謹請讀者原諒。

本書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國內許多學者的指導和幫助。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的王森和道布先生、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余大鈞先生都從業務上幫助過我們。西藏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陳家班、季垣垣先生以及該院漢文文獻編輯室的同志們都曾大力幫助過我們，他們仔細地審閱了譯稿，承擔了繁重的編輯任務，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書的譯稿避免了許多紕漏。沒有他們的熱情幫助和合作，本書是不可能與讀者見面的。我們于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耿昇翻譯，由中央民族學院藏族所王堯作了校訂并解決了一些藏文名詞的困難，由西藏社會科學院漢文文獻編輯室作了審訂和編輯工作。

由于譯者水平所限，錯誤和欠妥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不勝感激！

1986年8月1日于北京

耿昇譯

Giuseppe Tucci 著

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西藏的宗教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一 西藏的宗教

〔意〕圖齊 著

LES RELIGIONS DU TIBET

GIUSEPPE TUCCI

藏文字的拼寫和發音

在對藏文術語和辭匯的轉寫中，我沿用了伯戴克（L. Petech）提出的原則，唯一的區別僅僅是我在輔音前使用了 a 而不是'。此外，我在所屬格的形態中取消了'這個符號。例如，我由此寫作 Pai，而不是 Pa'i。

字母 S 的讀音如同 Sch，字母 Z 的發音如同法文中的 j。

濁塞輔音（g、j、d、bz）處于一個詞（也就是一個音節）的開頭處時，原則上應讀作清輔音（k、c、t、p、ts），但其音調要低一些。寫于前部（g、d、b、m、a）或上部（r、l、s）而作為聲母輔音的前綴音節不發音（唯有 Lha 除外，讀作 hla），但却保持了濁塞輔音固有的真正意義。如 gān 讀讀作 kang，而 sgañ 就應該讀作 gang。

y、r 和 L 等繼聲母輔音之後的音素會導致出現某些變化。pya、p'ya 和 bya 都顎化或 ca (tcha) 和 ja (dcha)，mya 顎化為 na。kra、tra 和 pra 三者均讀作軟音 t̥a，同樣也如同 k'ra 和 p'ra 讀作 t̥'a 一樣。gra、dra 和 bra 均作 da，sra 讀作 sa。當 l 出現在一個輔音之後時，該輔音就變作啞音了：bla-ma 讀作 lama，rlun 讀作 lung，唯一的例外是 zla 讀作 da。

尾音中的 d、l 和 s 要變成啞音，但却會引起音節的變化 brgyad、rgol 和 lus 分別讀作 gyä、gö 年 lü。n 也會出現某些變化，該字母但本身却保留下來了，如 brstan 讀作 tsan。

（見伯戴克于《東方學叢刊》第 1 編，第 5 卷，第 5 期中發表的文章，萊敦 1966 年版，第 347 頁）。

序 言

1958年初，《人類宗教》文集（它形成了一套值得仰慕的宗教史文集）的出版者克里斯特爾——M. 斯勒特爾博士請我負責其中的《西藏宗教》一節。我在表示同意之前曾顯得猶豫不決。因為寫一部有關西藏宗教的著作不是一件可以輕鬆地完成的任務。其主要原因如下：與其它宗教相比較，我們對西藏宗教的所知尚甚少；由該宗教產生的和可以闡明其歷史的大量文獻尚遠不能全部得到，也無人系統地論述過；尤其是因為其文獻如此浩繁，是一個人終生也無法掌握的。除此之外，還因為在寺院的喇嘛教與大眾平常所看到的那種宗教之間相差甚殊，前者分裂成了許多教派，後者則因地而異。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始終清楚地感到必須在描述喇嘛教之前先闡述其教理基礎，因為其教理基礎如同在佛教中到處都可以看到的那樣，自始至終都是以具體的宗教感受為前提並產生了不同教派各自特點的。但是，由於這一原因而應經常參閱印度佛教的理論，此外還應具體研究和證明古老的宗教感受與新思想和新內容結合之後而在西藏佛教中產生的新因素和獨立的特點。此外還應指出另外一大難題，甚至可能還是最嚴重的障礙，我們難以在具體解釋於一般宗教中通行的宗教術語的方式和在西藏宗教與奧義中流行的專用名詞之間達到一致。我們在兩種極端之間猶豫徘徊；幾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譯，如同在有關印度佛教問題上最常使用的那樣（但我們在這一問題上也發現有

一種類似的不相吻合性）；遵循近期出現的方式，即以一個差异懸殊的領域中的術語為楷模，也就是採納西方近代哲學潮流中的語言。這後一種作法無疑是最危險的下策，因為它會徹底歪曲或誤解西藏人的思想。由於這種境況，我祇好說服自己了，當時我向某些相當精通英文的藏族人出示近期發表的某些對藏文專著或對其所包含教理的注疏文之譯文時，藏族學者們也很難理解這些譯文中的某些意義，因為他們從中發現不了自己所習慣理解的那種佛教思想。此外，在大量藏族的思想和教理的背後，還隱藏着一些內心的感受和奧義事實，用常理性的觀念和術語來翻譯祇會使之出現無限的疑惑。有關這一切的藏文術語都是可以追憶親身所經歷的事實之象徵，文字本身僅僅能提示而不能說明其特性，在這一方面，大家要求我們所作的事極其棘手，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生造一些方言代用詞以形容發生在思想領域中的事件，則會徹頭徹尾地改變和篡改我們的真實的和虛幻的事實。我試圖以避免采納這兩種途徑的方法來翻譯藏文名詞術語，即拋棄咬文嚼字和杜撰臆造的方法，而是特別注重于把藏文專用名詞術語譯作最近似于藏族大師們可能賦予它們的意義。我不敢自信始終都能達到這一目的，但我自認為已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以使西方讀者們能理解形成西藏宗教理論基礎的特有的複雜結構，同時又清醒地認識到在這一方面存在着一些典型的有限度的例證；我們僅舉一例作證。作為喇嘛教教義棟梁的藏文詞 *sems*（精神），在英文字中有時譯作 *mind* 或 *mind-stuff* 等，而在我的著作中則有時也譯作“思想”（*esprit*）。但很明顯，“思想”和“心”這兩個字並不完全一致。藏文 *sems* 的詞義唯有（在具有理解書中全部內

容的同時）在讀者對這一觀念所包括的廣泛的引伸意義有一個全面瞭解時，纔會在他們的心目中變得清楚起來。所以，為了避免誤解，我始終都維持了藏文形式 *sems*，這樣一來就會逐漸導致讀者把此字與相應的觀念或與之相當的一系列思想聯繫起來。

我在完成自己的任務中，既得以參照本人的直接經驗和所經歷的事實，同樣又不禁注意到了我已獲悉的對我個人著作的書評。讀者將會在《參考書目》中發現所指出的許多這類著作，但本書目也絲毫未抱奢望而企圖使之臻于完整。我僅僅引證那些幾乎是每天接觸而使自己熟悉的著作。在正文中，僅僅在必須提供相應的論據和澄清某些問題時纔參閱這些書籍。由於本人的意圖是在本書中提供有關這一內容的概況總結，有關這一內容的附注要維持在最低限度內，也就是說主要是參閱一些獨特的文獻參考資料。總而言之，大家可以把我論著看作是對前人研究的追述和一種最終論著的初步醞釀，簡單地來說是對多年來有關西藏佛教研究之成果進行總結的一次嘗試。

如果大家還記得如下事實的話，那末就會對筆者的上述議論不會感到驚奇了。儘管今天獲得史料要比過去容易得多，儘管多年來不斷有關於印度哲學與宗教各派別的新著問世。但尚未能實現高屋建瓴地和令人心悅誠服地總結印度人的思想、尤其是印度人的宗教思想這一目的，筆者本人在《印度哲學史》（巴厘 1957 年版）中曾力圖完成這樣一種概括，其目的確實是為了澄清我個人而不是別人在這一領域中的思想。

格西（拉讓巴）強巴僧格是熟悉宗喀巴改革派及其分支的所有教理問題和全部特點的學者之一，他享有“黃教”

中最高和最令人歎羨的學位，他始終都十分樂意地向我提出各種建議，這一切對於我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那木喀·諾爾布教授也如此，他原是（德格）更慶寺的一位活佛，所以也可以說他是在寧瑪派的哲學教理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非常瞭解民間傳說的人。這兩位藏族僧侶八年來一直作為意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的合作者而生活在羅馬。諾爾布教授于那不勒斯大學東方研究所講授藏文。

我必須向施勒特爾博士表示歉意，本書的交稿時間可能太晚了（經過了數月的修改）。這一推遲是因為本人為意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從事考古研究而義不容辭地多次前往亞洲旅行。我對於他精心地和頗有才華地參與完成我的著作、非常熱忱地和異常公正地編輯手稿而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德譯文的翻譯工作委托給了古斯塔夫·格拉賽博士，他是意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的合作者，多年來一直居住在羅馬。他身上匯集了非凡的精通意大利語的人與關心歷史研究的學者應有的才能。我本人得以逐章地關注其翻譯工作的進展。其譯文忠實地譯出了我所提供的原文。我衷心地感到應特別向他表示我的謝意。

我們應感激諾爾布教授繪製了本書中所有的圖案。意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的菲奧倫蒂尼先生提供了這些插圖的定稿圖案。我向他們二人精誠的合作精神表示感謝。

我也應向羅馬的喬瓦娜·佳麗彼·瓦勞里博士夫人表示感謝，她當我長期不在羅馬的一年多的時期內（我當時正完成委托給自己在東方進行考古發掘的工作）與斯勒特爾博士保持聯繫，以其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工作并在修改時